

CSSCI来源期刊(集刊类)

WAIGUO ZHIXUE · 30 ·

外国哲学

第三十辑

商务印书馆

CSSCI来源期刊（集刊类）

外国哲学

第三十辑

 商务印书馆
创于1897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国哲学,第30辑/赵敦华主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ISBN 978-7-100-12091-3

I. ①外… II. ①赵… III. ①哲学—国外—丛刊
IV. ①B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53833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外 国 哲 学

第三十辑

赵敦华 主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冠 中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978-7-100-12091-3

2015年12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5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1

定价: 29.00 元

主办：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

协办：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

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

主编：赵敦华

执行主编：杜丽燕

学 术 委 员 会

(以姓氏拼音为序)

卞崇道(中国社会科学院)

陈小文(商务印书馆)

邓晓芒(华中科技大学)

杜丽燕(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傅有德(山东大学)

韩水法(北京大学)

江 怡(北京师范大学)

刘 闯(美国佛罗里达大学)

尚新建(北京大学)

孙永平(北京大学)

徐向东(浙江大学)

姚卫群(北京大学)

张汝伦(复旦大学)

张志林(复旦大学)

赵敦华(北京大学)

陈嘉映(首都师范大学)

程 炼(武汉大学)

杜小真(北京大学)

冯 俊(中国浦东干部学院)

韩林合(北京大学)

韩 震(北京外国语大学)

靳希平(北京大学)

倪梁康(中山大学)

孙向晨(复旦大学)

谢地坤(中国社会科学院)

王树人(中国社会科学院)

翟振明(中山大学)

张祥龙(北京大学)

张志伟(中国人民大学)

周晓亮(中国社会科学院)

卷 首 语

《外国哲学》于1984年由商务印书馆创办,至1998年共出版十四辑,开创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研究外国哲学的新学风、新传统,在学术界具有广泛的影响。经与商务印书馆商议,从第十五辑开始,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负责承担《外国哲学》的组稿、编辑工作。

为了进一步提高《外国哲学》稿件的学术水准,我们采取了国际学术刊物通行的“双盲”审稿制度。除了继续发表对外国哲学历史和经典的诠释性论文外,本刊将特别注重发表史论结合、批判性评论、中外哲学比较等方面的佳作。我们衷心希望全国同仁鼎力襄助,不吝赐稿,把《外国哲学》办成群贤毕至、百家争鸣的学术园地。

《外国哲学》编辑部

2002年4月

执行主编的话

清晨,朝阳透过雾霾,露出无奈的微光。水浸浸的空气闷得人透不过气来。蓦地,耳边传来一声凄厉的蝉鸣。好近啊。举目望去,一只巨大的蝉趴在纱窗上,目光炯炯地盯着显示器,“借问蝉声何所为?”莫非陶醉哲学中?好一只哲学蝉啊。

本期《外国哲学》第一个栏目是“中世纪哲学研究”。这个栏目是本刊长期关注的重点之一。之所以关注,原因有二,其一,到目前为止,国内西方哲学研究界,研究中世纪者为数不多,作品相对较少。可以说,中世纪哲学研究是外国哲学研究相对薄弱的地方。其二,在西方哲学史上,中世纪哲学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它承上启下。如果对中世纪缺乏研究,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无法阐释清楚近代哲学是怎么来的;经过中世纪之后的希腊哲学,即文艺复兴时期崇尚的希腊哲学与中世纪前的希腊哲学相比,究竟发生了何等变迁。

本栏目由两篇论文组成。徐龙飞教授的论文“论奥古斯丁《忏悔录》第11卷中时间理论的内在逻辑结构”,主要讨论奥古斯丁如何超越古典、从外在现实的时间论出发,提出独特的主体时间观。作者认为,就思维方式而言,奥古斯丁不仅在永恒与时间之间,而且在现实的时间与构想的时间之间,发现一种内在的关联,这些内在关联也是奥古斯丁时间概念的内在结构。就哲学史而言,奥古斯丁不仅从古典的传统中汲取宇宙论—物理论的现实时间,而且从犹太教—基督宗教中汲取存在论—历史论的现实时间,以填充、阐释和分析本体论的疑难所指的现实时间的某种虚无性;于是,古典传统中的循环论时间观,便奠基在对于同一事物不断循环往复进行观察的基础上。就宗教和神学传统看,奥古斯丁还汲取了犹太教—基督宗教的历

史时间观;构想时间的人(精神、灵魂)就立足于历史的时间中,在这一宗教传统中,历史的时间具有别样的品性,这一历史时间观的基础是将人类史视为救赎史,人类历史处于上帝的救赎计划中,这一计划将以一个新的、得救的世界解除陈旧的、已然腐朽的世界。相信读者认真阅读此文后,会对奥古斯丁的时间问题产生深厚的兴起。

杜丽燕的论文“阿拉伯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主要探讨阿拉伯亚里士多德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及他们所倡导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如果说中世纪哲学研究不太受人关注,那么阿拉伯哲学研究几乎是无人问津。众所周知,十字军东征的重要成果之一,是为西方基督教世界带来了亚里士多德主义,由此才有了西方世界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兴起。论文简要说明亚里士多德东部学派和西部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思想,着重阐释东部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代表人物阿维森纳在必然性与偶然性、灵魂问题、共相等问题上与亚里士多德本人的异同,以及相关问题对后期经院哲学的影响。论文也解读了西部亚里士多德主义代表人物阿威罗伊如何从阿拉伯思想的立场,诠释亚里士多德关于逻辑与真理、形式与质料、灵魂问题的见解。作者表明,阿维森纳和阿威罗伊只是亚里士多德思想的诠释者,他们似乎没有太多的创造性。不过,就是这种诠释,为经院哲学以降的亚里士多德研究,增加了一丝阿拉伯色彩。

第二个栏目是“近代哲学研究”。本栏目由三篇论文组成。第一篇论文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吴天岳教授推荐并且翻译的伯纳德·威廉斯的论文“笛卡尔与哲学的历史书写”。本刊之所以刊登此论文,不仅因为作者被哲学界视为当代英国最伟大的哲学家,而且因为此论文提出了一些有趣的、值得思考的问题。作者指出,对于笛卡尔研究,宽泛地说有两种路径:思想史和哲学史。作者告诫说:如果认为上述区分毫无根据,或者以为对一个哲学家的最好的历史研究进路在于这两种研究活动的理想融合,这就错了。“哲学史”的研究路径的特出之处,既在于关心自己的成果是否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哲学,也在于对历时性影响(这个短语本身就特别能让人想起这方面)的兴趣。作者之所以提到哲学史的研究路径,是因为受分析学派哲学史方式的

影响,用当下的术语处理过往的哲学。忽视过去哲学与今天之间的那段历史。这种方式也造成了对笛卡尔的误读。当我们用思想史和哲学史解读笛卡尔,很可能会产生两种理解类型中的一种:一种纯粹历史的,另一种很大程度上是年代错乱的。思想史会使我们去了解晚期经院哲学的影响和拉夫赖士(La Flèche)的课程表,或者向我们引介在发展一种恰当的惯性力学中所遭遇的难题。哲学史则会谈及人们如何从怀疑论出发,发展一套非先验论(non-transcendental)的知识论。思想史式的研究自身并不能产生多少哲学,它孜孜以求的,是以简单而安静的方式研究过去。哲学史通常在解除我们的前见(preconceptions)上并没有做得更多。前者本身并不产生哲学;后者产生哲学,但太多时候它产生的是我们的哲学。它们两个都不能帮助我们借用笛卡尔来赢得尼采所说的一种对我们哲学关注的“不合时宜的”认识。相信读者在阅读完全文后,会有不少斩获。

汤姆·洛克莫尔,北京大学哲学系人文讲习教授,向本刊提交了一篇论文:“柏拉图与康德建构主义”。作者把批判哲学描述为对柏拉图立场的反驳和纠正,以强调用一种历史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康德的思想。本文考察了批判哲学与柏拉图思想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自己论证了五点。第一,巴门尼德在西方传统哲学之初便提出了深具影响力的知识的权威标准。第二,柏拉图否认由果到因的反向推论,因而也否认通过表象的方式进行认知。第三,康德进而延续了柏拉图对表象主义的否定。第四,康德与柏拉图不同之处在于,他在接受哥白尼转向或者说建构主义时,也否认了认知直观。第五,论证了双重方面论断与康德的建构主义是不一致的。

作者断言,康德既是现代的,也是非现代的。像许多其他的现代思想家一样,他否认理智直观;但又与许多现代的思想家不同,他也反对由果到因的反柏拉图式的反向推论。他的哥白尼式的革命正是一种反柏拉图式的尝试。在康德之前,形而上学实在论一直是现代争论中更受欢迎的立场。然而正如康德所指出的,在他之前从未有过朝向这个目标的任何进步,并且自康德以来再也没有任何进展。因此,随之而来的是,如果我们想要避免怀疑论,唯一合理的途径是,假设主体建立客体。就此而言,康德曾经,也许仍将

领先于其时代,因此,我们敢说,他是后现代的。

李伟教授的论文“西欧启蒙时代形而上学的普遍危机”一文,探讨欧洲启蒙时代形而上学的普遍危机。作者描述说,1761年6月4日,普鲁士皇家学院(柏林科学院)向欧洲学术界发布了1761—1763年度有奖征文事宜。从这次征文,作者认为自己看到如下问题:那时形而上学的处境实在不妙得很,都引起了当时最高学术机构和整个学术界的普遍担忧;其次,这种担忧迫使哲学界要为形而上学寻得几何学那样“无可置疑的确然性”。在这两者背后还有两个未经言明的背景:其一,“形而上学,作为理性的自然禀赋,是现实的”,像空气之于呼吸一样,“世界上任何时候都将有形而上学”,“每个人都将以自己的方式来裁剪形而上学”;^①其二,刺激学术界和科学院出此题目的主要原因,那就是自然科学理论的日益精进和巨大成功,尤其牛顿力学,以致促成了18世纪后普遍盛行的“理性自信”甚至是“理性自负”以及“方法至上”的观念。

第三个栏目“现代哲学研究”由两篇论文组成。龚重林博士的论文“德勒兹‘三本伦理学’之释义”,探讨德勒兹的斯宾诺莎伦理学研究。作者讨论问题的基本立场是:德勒兹对斯宾诺莎三本伦理学的探讨是后现代立场。作者指出,必须将德勒兹对斯宾诺莎《伦理学》的比喻:“表征的暗影之书”,“概念的色彩之书”,“本质的光之书”放在其单义性存有(univocity of being)的后现代视域下。换言之,即在同一个存在平面的无限事物表现的内在性(immanence of expression)之动力学重构中,才能够予以适切理解。要之,新的斯宾诺莎哲学既是事物表现性所在的无限光影交织,也是所有差异的内在性之肯定思维,本质是多中见一,一中见多;三本伦理学,同一个缤纷世界。

韩林合教授的论文“郭象自我观剖析——当代形而上学的视野”一文,从当代形而上学的视角,讨论郭象的自我观。作者经过一番细致的对比得

^① 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注释本),李秋零译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2、105页。

出如下结论:郭象对作为流俗自我观之基础的物我之分的消解,是对庄子相关文本的准确解读的结果。不过,他对流俗自我观中有关自我持存性断言的批判,不仅大大发展了庄子的相关观点,而且还与现代哲学中所谓四维事物观和分存论中的一些核心观点不谋而合。

第四个栏目“哲学问题研究”刊登了李葵博士的论文“解释排斥与因果排斥能否同时成立”。论文讨论美籍韩裔哲学家金在权(Jaegwon Kim)的排斥原则。主要探讨这条原则的认识论版本——解释排斥与其本体论版本——因果排斥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金在权排斥原则理论在解释实践、对完全解释的处理,特别是属性的解释效力方面存在深层问题。作者断言,解释排斥与因果排斥未必能够同时成立,而放弃解释排斥似乎是一个自然的选择。近年,由于金在权的一些作品被译成中文,因而形成了一个小众研究气候。

“青年之窗”通常刊登青年新锐的作品。本期刊登施璇博士的论文“心灵、广延与位置——笛卡尔关于心灵的说法所蕴含的困难及其解释”。作者认为,学者们从笛卡尔不同文本中归纳出笛卡尔关于心灵问题的三种不同的说法:“心灵没有广延”、“身心具有共同广延”以及“心灵具有位置”,并认为这三种说法在理论上彼此矛盾,不能共融于一套理论体系中。一些学者甚至将之看作为“笛卡尔哲学体系中最脆弱的一点”。作者对此持否定态度。她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试图论证只有第一种说法,即“心灵没有广延”,才是笛卡尔所主张的观点,后两种说法都是不同程度的误读。因此,上述困难并非笛卡尔理论之困难。

温雪博士的论文“萨特的意向性概念——萨特在《形象意识》中对胡塞尔意向结构的批评”,探讨萨特对胡塞尔意向结构的批评。作者认同 Corebyter 一种立场,即萨特和胡塞尔之间的主要分歧在于:前者试图在形象意识与知觉这两种意向性结构之间做出“一系列根本的区分”,而“胡塞尔所成功做到的是,相反,使形象意识更接近知觉”。不过作者进一步指出,Corebyter 只关注了导致两者接近的一个方面,即萨特所论述的,胡塞尔将形象意识的质料与知觉的质料相等同;作者认为,他忽视了更为重要的萨特对

胡塞尔意向行为一意向相关项意向结构的批评,在萨特看来,意向行为一意向相关项的结构会导致知觉对象无法和形象物区别开来,使得前者丧失其特有的“超越性”或自足性,后者缺失“虚无”或当下不在场的特征。作者指出,这一视角下萨特对胡塞尔的批评,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萨特为何在《形象物》中构建自己的意向性理论时取消了存在于意识之中的质料。这也从一种意义上体现了《形象意识》和《形象物》之间的连续性。刘哲教授向本刊推荐此论文时如是说:“这是一篇非常有现象学理论贡献的学术论文。”

今年的夏天好像格外长、格外热,想到作者们挥汗如雨地辛勤耕耘,真是“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既感动且不安。轻轻地道一声,辛苦了。

目 录

执行主编的话	(1)
--------------	-----

中世纪哲学研究

徐龙飞 论奥古斯丁《忏悔录》第 11 卷中时间理论的 内在逻辑结构	(1)
杜丽燕 阿拉伯的亚里士多德主义	(28)

近代哲学研究

伯纳德·威廉斯著 吴天岳译 笛卡尔与哲学的 历史书写	(48)
汤姆·洛克莫尔著 刘璐译 柏拉图与康德建构主义	(57)
李 伟 西欧启蒙时代形而上学的普遍危机	(68)

现代哲学研究

龚重林 德勒兹“三本伦理学”之释义	(87)
韩林合 郭象自我观剖析——当代形而上学的视野	(106)

哲学问题

李 癸 解释排斥与因果排斥能否同时成立	(117)
---------------------------	-------

青年之窗

施 璇 心灵、广延与位置——笛卡尔关于心灵的 说法所蕴含的困难及其解释	(131)
温 雪 萨特的意向性概念——萨特在《形象意识》中 对胡塞尔意向结构的批评	(143)

论奥古斯丁《忏悔录》第 11 卷中 时间理论的内在逻辑结构^①

徐 龙 飞

内容提要：奥古斯丁不仅从古典哲学和宗教的传统出发建构其时间概念以及在此之上的时间理论，而且他超越古典、从外在现实的时间论进而提出独特的主体时间观，在观照上帝时以永恒与时间的关系作为其理论的基础和基本结构，其建构时间理论的方法具有神学、哲学意义。

关键词：时间 永恒 上帝 奥古斯丁

一、问题的提出及其历史——古典哲学的以及犹太-基督宗教的传统

关于奥古斯丁时间理论的研究有颇多不同之角度，有学者，譬如德国学者杜赫洛夫(U. Duchrow)认为，奥古斯丁是心灵时间论之父(或曰：心理时间论之父)，这一观点认为，奥古斯丁是第一位将时间去宇宙论、去物理论的人，也就是说，他脱离了与传统的联系，不再从对诸如行星以及其它物体的运

^① 本论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4JJD720004)阶段性成果。

动的考量入手而探讨时间,取而代之的是,从灵魂出发、从阐释灵魂的存在方式出发而思考时间^①;而也有学者认为,这一论定需要更精确的限定或修正^②。

奥古斯丁的时间理论并非单纯对于时间概念的探讨,而是与历史、永恒等概念有着不解之缘;我们在此面临的问题是,永恒与时间这一体系是否是一个等级秩序?如何理解其内在的结构?这一理论究竟应当如何定性?究竟是宇宙论的,亦或是心灵论的?究竟是物理论的,亦或是历史论的?亦或是别的什么?

1. 处于希腊古典哲学传统中的奥古斯丁

早在柏拉图的时间哲学中,时间就是永恒的肖像,尽管时间首先仍然与宇宙的运转和星球的周行相等同,但是在这一等而视之的情形中也已经透析出时间与灵魂的某种内在联系;不仅如此,个体的灵魂在对行星有规律、有同样形式的运行的默观中,也能在自身中产生内在的规律性,同时,由这一默观不仅能在内心模仿其运行及规律,而且还能达到心灵的宁静^③;而柏拉图的画外音还在于,即使是所谓世界灵魂(世界精神)也作为自身关涉性和自身运作性而被时间所标示,并且是自然而然被关涉自身且周行不殆的时间所标示,而且将这一时间转承到宇宙之中,也就是说,世界灵魂作为一种建构的原则而运作。

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灵魂与时间的联系也颇为紧密。他在《物理学》IV, 219b 中对于时间庶几作了定义,时间在这一定义中被理解为按照运动的先后而来的数字(数量、量),这一定义以能够主动计量的灵魂为前

① 参见 U. Duchrow, "Der sogenannte psychologische Zeitbegriff Augustins im Verhaeltni zur physikalischen und geschichtlichen Zeit", In *Zeitschrift fuer Theologie und Kirche*, Band 63(1966), S. 267-288. J. F. Callahan, *Four Views of Time in Ancient Philosophy. On the Views of Plato, Aristotle, Plotinus and Saint Augustine*, Cambridge, Mass., 1948, p. 204.

② 参见 Karen Gloy, "Die Struktur der Augustinischen Zeittheorie im XI. Buch der Confessiones", In *Philosophisches Jahrbuch*, 95, Jahrgang 1988. Verlag Karl Alber, Freiburg/Muenchen, S. 72-95, 特别是 72.

③ 参见柏拉图:《蒂迈欧篇》, 47a 以下。

提,或曰:以灵魂计量的主动性为前提;这一时间概念建立在从持续性的时间长河中截取某一连续的时间段落的基础上,即使在运动中诸如此类的纯粹现象的时间并不回溯到灵魂中,在这一概念中所理解的时间也必须奠基在有规限的和有计量功能的灵魂中才有可能成立;亚里士多德甚或尝试放弃外在运动对于时间定义的必然性,在他看来,在闭目观想和外在的运动敬告阙如时,纯粹的靈魂的运动足以在其自身的限定(自我决定)中给出时间概念,在这一点上,奥古斯丁更超出于他。

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全部古典时代,时间的神话化、宇宙论化以及天文学化似乎在时间研究中占主导地位,个中原因似乎在于,天体的运动给出了限定时间的最终标准;尽管如此,至少在布洛丁那里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时间的心灵化或心理化,时间不仅被视为灵魂的生存方式、存在方式,而且时间的心灵化也在于阐释灵魂的存在方式,布洛丁试图从心灵追求的内在结构阐释时间的结构;当然,他并未放弃(至少并未完全放弃)时间的宇宙品性或宇宙关联性,他将灵魂也理解为世界灵魂,在他的 hypostasis 系统中,这一世界灵魂不仅是宇宙的建构法则,而且个体单一的靈魂也都参有到其中。^①

在上述阐释和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庶几可以说,时间的心灵化与主体化的论题,使得时间成为人存在方式的论题,时间坐落在人的存在之中,坐落在人的存在方式之中;尽管奥古斯丁并非时间心灵化的始作俑者,但是他继承古典而成为集大成者。而当人提及时间的心灵化(心理化)和主体化时,时间通常都很乐于被视为栖身于灵魂的内在中,并且作为时间的想象、时间的历验、时间的经验而呈现在灵魂中。在奥古斯丁看来,在时间作为灵魂的存在方式与时间作为在灵魂中的想象之间,在现实的时间和在灵魂中的时间想象之间,是应当,甚或必须做区分的。无论时间还能够被视为什么,奥古斯丁的创新的贡献在于发现了内在于主体的时间,或者更确切地说,在于

① 参见徐龙飞:《形上之路——基督宗教哲学建构方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特别请参见其中关于 hypostasis 的长篇论述。

发现了内在主体的时间；相对于古典希腊的宇宙论的、天文论的，甚或神话论的旨趣，奥古斯丁的旨趣在于时间的本体论、认知论、心理论（心灵论）、历史论以及神学论等方面，于是在他述及所谓世界时间时，本质上也是在讨论人的时间。

2. 处于犹太-基督宗教神学传统中的奥古斯丁

除了古典希腊的，奥古斯丁还秉承犹太和基督宗教的传统，在构想的时间和现实的时间之外，他还阐释和分析永恒，这是另一个与时间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概念，他将永恒视为时间的原则、时间的准则，永恒同时是时间的本源和目的；永恒的构想及其与时间关系的阐释，并非纯粹地出于现象学和心理学的考量，一方面，它们庶几更多地出于传承而来的形上与神学的假设，譬如柏拉图的本体形上构想（亦即时间是永恒的肖像），另一方面，它们也来自于《圣经》“创世纪”的神学构想，亦即永恒的上帝创造天地与时间。

奥古斯丁既非出自任意和想象，亦非仅仅出于自身研究兴趣和理智的好奇而建构他的时间概念，而是身陷于希腊古典的时间理解之中深思熟虑地建构的。古典哲学对时间的阐释萦绕甚或纠缠着他，使他欲罢不能；问题的焦点在于，如果将时间置于与现实事物的关系中来考察，或曰：如果将事物置于时间中来考察的话，那么人就难免限于一种窘境之中，亦即随着时间的过往、流逝，不仅似乎时间并不存在，而且在时间中的事物也不复存在，或曰：人只能宣布时间与事物并不存在，因为正如奥古斯丁自己所分析的，只要人将时间视为一种延展，那么作为过往，时间已经不再存在了，作为将来，时间还尚未存在，而作为当下，时间则是一种偶然；而如果不将时间视为一种延展的话，那么时间近乎于一种虚无；而如果人要抓住、握紧时间的话，那么时间并非别的什么，而是转入到主体中而成为想象（设想）^①；在奥古斯丁

^① 卡拉翰(J.F.Callahan)甚至指出，除了陷于古典的疑难之外，奥古斯丁的时间主体论（或曰主题时间论）是接受和继承尼撒的格里高利的观点而来的，参见 J.F.Callahan, "Gregory of Nyssa and the Psychological View of Time", In *Proceedings of the XIII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Philosophy*, Firenze 1960, S.59-66.

看来,尽管时间或事物的运动有其外在于人的灵魂的一面,但是人的灵魂(或曰:人作为主体)是时间经验的前提,这是时间经验的主体限定,它同时具有建构客体的功能,这使得时间作为客体庶几只能在主体的心灵、主体的想象中存在(正如奥古斯丁自己所说的:“In te, anima mea, metior.”也就是人在灵魂中测度和理解时间)。

二、外在现实的时间

在关涉,甚或梳理上帝与世界之关系的创世主题中,时间也被从肯定和否定两方面而言说;一方面,时间被视为受造物,而时间作为受造物则并不属于始元的维度,而仅仅是创造行为的结果而已,这被视为否定方面的言说,相对于永恒的完美存在,时间被视为虚无、匮乏等;另一方面,时间被视为上帝的产品,并且作为上帝的产品而参有到神性之中,时间借着与永恒上帝的关系则从不会沦落于虚无之境地,而是总会保持其正面的品性。究竟什么是时间的本质?奥古斯丁在《忏悔录》第 11 卷第 14 章中“什么是”的质询开启了原本意义上的时间分析。

1. 时间的三种类型所提示的理论疑难

日常生活中对于时间的经验有两个标志,或曰:有两个标志的纠合,一个标志是时间的三重样态模式,亦即过往、当下以及将来^①,时间建构在其中、呈现在其中,另一个标志是时间的流逝性,这其中实际上也呈现出较早、较晚以及同时三种划分,而且对于每一个较早而言还有更早,对每一个较晚而言还有更晚,在这一系列中呈现出明显的相对性。就三重样态的模式而言,是否它们涉及自然的、原本的时间限定,或者由传统给出的、重新激活的,并且奠基在长久的思考习惯的基础上因而成为不言自明的时间限定,奥古斯丁并不十分清楚;他承认他从年轻时代就知道了这些,以至于对于他而

^① 参见奥古斯丁:《忏悔录》第 11 卷第 17,20 章。